

BuddhistRoad 出版物：摘要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 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6/60/36602e02-7cf2-4445-b94c-c58778f86c78/2022_kasai_and_sorensen_ed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pdf

BuddhistRoad (佛教之路) 研究项目受 ERC (欧洲研究中心) 资助，旨在构建一种新的框架，使人们能够理解古代中亚东部 (pre-modern Eastern Central Asia) 复杂而动态的文化相遇 (cultural encounter) 和宗教转换 (religious transfer)。该项目视佛教为这种交流的一个主要因素：将首次系统地探讨跨区域佛教传统 (汉传佛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 与不同的地方佛教文化 (于阗, 回鹘, 西夏, 契丹) 的多层次关系。第二册《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以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CERES (宗教研究中心) 举行的项目中期会议为基础，重点讨论该项目所涉及的六个主题中的两个，一为“实修和仪轨”，主要探讨宗教语境中的物质文化，如坛城和护身符。另一为“图像与物质转移”，着重探究共享的图像和“于阗”主题的传播。

(1) **Keyworth, George**：《丝绸之路是否从敦煌、五台山和长安延伸至日本京都？天台寺门宗三井寺物质文化再考》，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 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17-67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dd/08/dd084a85-2a38-4c52-ac47-71e13a82f75c/9789004507937_07-keyworth.pdf

摘要：

丝绸之路是否真的延伸到了早期亦或中世纪的日本？本文以两位去过中国朝圣的天台寺门宗三井寺的核心人物圆珍 (814-891 年, 智证大师) 和成寻 (1011-1081 年) 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 9-11 世纪，丝绸之路是否通过天台寺门宗延伸到了日本？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了圆珍带回的游记和《请来目录》、雕像和仪式器物等所列出的材料是如何证实他从中国传回的佛教可以与世界性的仪式实践联系起来，即使在会昌法难 (840-845) 之后这些仪式实践也在东部的丝绸之路上蓬勃发展。日本京都松尾大社制作的最早的本土神像之一 (至今仍保存在那里) 是圆珍在参与世界性的东亚佛教仪式时的一个重要器物。

接下来的部分笔者探究了成寻在 1072-1073 年间的游记《参天台五台山记》，书中讲述了他不仅在五台山，还有在宋朝首都汴梁 (今开封) 受皇家供养的太平兴国寺的译经机构传法院与中亚和印度上师们的接触。成寻描述的为宋神宗 (1048-1085) 举行的几次仪式与我们知道的 12-16 世纪期间在大云寺和实相院 (位于京都北部的岩仓地区)，还有诸如松尾、上贺茂、京都的下鸭、名古屋的热田等重要神社举行的几次仪式相当。

最后，笔者探讨了 9–11 世纪在丝绸之路东段上交流的佛教—和印度或中亚—仪式是如何与物质文化（如雕塑和仪式器物）一起在日本被天台寺门宗僧人用来供奉神祇的，僧人们用清晰的世界性语言维护了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叙事。

(2) Konczak-Nagel, Ines: 《龟兹佛教石窟所绘大型佛像系列的起源与意义探究》，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68–96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d0/93/d093bffc-7710-4e9c-a166-efbfdc401c14/9789004507937_08-konczak-nagel.pdf

摘要：

丝绸之路北道龟兹地区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反复出现的一组图像是成排占据整个墙面高度的大型站立佛像。根据它们在石窟中的位置和规模，可知这组壁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鉴于目前对这组壁画尚未有令人满意的分析，笔者对其发展方式及发展原因进行了探究。

无论从构图还是风格上看，龟兹壁画中的佛像系列都让人联想到了 5 世纪早期犍陀罗艺术中出现的多组大型佛像雕塑，而且很可能深受这些雕像影响。如同犍陀罗雕刻艺术一样，这些龟兹壁画中的系列佛像也被安置在绕行仪式的沿途。

龟兹大型佛像系列有一个不同于所有其他艺术流派的独特之处，即往往有一个向佛陀献特定供养的小型图像伴随出现，从而暗指某种佛教叙事。因而，伴随出现的小型图像即成为识别相应佛陀的元素。从目前识别出的小型图像可知，系列中的每尊佛像都是佛陀的某一前世。

(3) Lo Muzio, Ciro: 《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佛教绘画：时间谜题》，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97–117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71/98/719874ff-1e56-49a3-a6a1-2464d7f5a15a/9789004507937_09-muzio.pdf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佛教绘画，具体而言即是在于阗绿洲及更东部克里雅河流域的喀拉墩遗址出土的佛教壁画。这些发现来自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发掘，在经历漫长的空白期后，从 1990 年代到最近又进行了发掘。发现壁画的田野调查方法和记录的准确性大相径庭，制定对它们进行断代的标准也是如此：从 3 世纪（喀拉墩）到 6–8 世纪（于阗绿洲）。如此之大的年代跨度似乎有悖于壁画在构图和风格取向上的相对接近。本文介绍了这一主题的艺术水平，并初步尝试去发现能获得更均衡的断代方法的线索。

(4) Forte, Erika: 《敦煌的于阗主题：9–11 世纪的图像和意识形态转换》，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118–152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88/57/88573a80-17d7-401e-9092-5faeccabc67/9789004507937_10-forte.pdf

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于阗和敦煌这两个重要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在敦煌艺术中体现的所谓“于阗主题”，强调了塔里木盆地的文化和物质转移机制。

这里的“于阗主题”是指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发现的主要出现于 9–11 世纪早期的时间跨度内的特定图像。这些图像包括：瑞像，被称为八大守护神的于阗国守护神（于阗语：*haṣṭā parvālā*），于阗建国的传说，以及对于阗最神圣的地方——牛头山/牛角山——的描绘。这些主题出现在于阗的佛教和文化环境中，并通过这一时期两个绿洲之间的密切关系传到敦煌。这些主题很可能是由居住在敦煌的一个（半）永久性的于阗人社群所推广。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敦煌的于阗主题越来越关注，更多的曾很少被研究或迄今未被注意的材料被加以利用。本文概述了这一主题，并对包括最近在于阗绿洲发现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最新的评估。

(5) Russell-Smith, Lilla.: 《“粟特神祇”研究二十年：敦煌白画再考》，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 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153–206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58/9b/589b316d-6424-437f-adce-ea2bea8371ff/9789004507937_11-russell-smith.pdf

摘要:

本文重新探讨了所谓的“粟特神祇”在敦煌研究, 袄教研究和丝绸之路研究中变得如此出名的原因, 并提出了新的证据以支持笔者原来的观点, 即编号 P.4518 (24) 的敦煌白画是专门为敦煌的回鹘供养人 (很可能是佛教徒) 制作的。它也可能展现了摩尼教的特征, 因为回鹘佛教艺术在早期阶段经常如此。最后, 笔者认为右边的女神或许有天文含义, 她坐在一只狗身上, 象征着天狼星。

(6) Wang, Michelle C.: 《追寻西夏艺术中的净土》，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 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207–243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28/0c/280ca473-87bd-456e-ba4e-9e81c18c570b/9789004507937_12-wang.pdf

摘要:

冬宫 (the Hermitage) 收藏有一组耐人寻味的画作, 最初来自黑水城, 画中阿弥陀佛接引信徒的灵魂进入西方净土。由于接引图在中古中国, 韩国和日本有广泛的地理分布, 因此学者们对这种图像的起源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本文重点讨论阿弥陀佛的接引往生主题, 以阐明跨文化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前的学术研究强调年代, 艺术风格和图像学, 以便将西夏帝国 (约 1038–1227) 的绘画置于宋朝 (960–1279) 和其邻国之间。与

此相反，笔者讨论了印刷文化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使得西夏接引图区别于亚洲其他地方产生的类似图像的物质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探究了这种图像主题的跨文化共性。

(7) **Kasai, Yukiyo**: 《前蒙元时期敦煌和吐鲁番的观音信仰》，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 《中亚的佛教 II: 实修和仪轨, 图像和物质转移》, 莱顿, 波士顿: 博睿出版社, 2022 年, 第 244–268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72/d5/72d5a1cf-1a84-46d9-84ba-5f476c56fdb1/9789004507937_13-kasai.pdf

摘要:

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艺术品和文本资料显示了居住在这里的佛教徒对各种菩萨的虔诚崇拜。回鹘人无疑是那里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之一。来自敦煌的汉传佛教的影响在大多数回鹘人皈依佛教后成为回鹘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回鹘语中的一些经文资料与在敦煌广泛流传的汉语版本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敦煌和吐鲁番的佛教团体之间存在着互动，一些佛陀和菩萨的信仰则可能通过这些互动而被共享。其中之一即是对观音菩萨的信仰。在敦煌，有文字和图像的资料显示观音信仰的实用性。重要的是，汉语的祈愿文将观世音菩萨描述为疾病的救度者和往生的指引者。相反，在吐鲁番，虽然许多幡画都是关于观音菩萨的，但古回鹘语的文字资料既没有涉及这一崇拜，也没有提到菩萨在上文中的任何角色。这位菩萨在吐鲁番的文字和艺术资料中的缺席，被认为是由于回鹘人和汉人一样也参与了佛教活动所致。汉传佛教对观音信仰的强烈影响，或许在吐鲁番的汉传佛教群体和与该群体有密切关系的回鹘佛教徒中都有体现。

(8) **Dalton, Jacob P.**: 《瑜伽与摩诃瑜伽的桥梁: 密教早期的三昧耶戒》，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 《中亚的佛教 II: 实修和仪轨, 图像和物质转移》, 莱顿, 波士顿: 博睿出版社, 2022 年, 第 270–287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8/78/38784144-5484-47ea-ba8c-a1c80538c89d/9789004507937_14-dalton.pdf

摘要:

本章强调了三昧耶戒 (*Samaya*) 在早期密教仪式发展中的作用。在早期的密宗著作中，三昧耶戒的功能不仅是要遵守的誓句，或一组誓句，而且是被作为佛陀的智慧 (*jñāna*) 以仪式的方式安住于修行者的心中。本文展示了三昧耶戒如何在《金刚顶经》 (*Sarvatathāgatattvasaṃgraha*) 的密宗瑜伽 (*Yogatantra*) 体系的灌顶和灌顶后的修习 (*sādhana*) 实践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在这两种仪式的背景下，修行者内化三昧耶戒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时刻。关于随后的早期摩诃瑜伽 (*Mahāyoga*) 的仪式传统，本文认为，早期三昧耶戒概念的性化产生的秘密灌顶 (梵文: *guhyābhiṣeka*) 和随后菩提心明点的自我施用 (*self-administering*)，是性瑜伽的巅峰的标志，分别与《金刚顶经》的灌顶和自加持 (*self-consecration*, 梵文: *svādhiṣṭhāna*) 类似。在某些早期的摩诃瑜伽

文本中，瑜伽和摩诃瑜伽之间的发展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文本中，菩提心的滴落被称为最殊胜的三昧耶戒（藏文：*dam tshig mchog*）。

(9) Sørensen, Henrik H.: 《观想自己为宇宙：敦煌的一件密教禅定文本》，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288–312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e4/0b/e40bcc0-f072-40d3-8d5b-ff7d12014c59/9789004507937_15-sorensen.pdf

摘要：

本章重点介绍伯希和藏品中的一份来自敦煌的密教禅定文本（P. 2649V^o，S. 6897V^o），其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前的学术界所忽视。这份手稿没有注明日期，且本身也没有标题，使得对它及其背景的评估变得复杂。然而，其详细而生动的对冥想的指导内容表明这个文本记载着普通的密教信仰和实修。笔者非常感兴趣的是，整个禅定和观想的过程被表述为一种普度众生的内观仪轨。本文对该文本进行了完整译注，并与一个汉文本进行了对勘。

(10) Meinert, Carmen: 《超越时空的偶然：11–13 世纪西夏统治下的中亚东部密教仪轨》，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313–365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5/08/35089c9a-75fc-4ad8-be31-bd555ceacad1/9789004507937_16-meinert.pdf

摘要：

密宗佛教仪式在中亚东部西夏统治时期（约 1038–1227 年）的实践，可以根据各种佛教遗址的物质、图像和文本资料来研究。通过阅读各种共享背景的资料，笔者认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的一些洞窟很可能被用于禅定和仪轨实修，甚至包括瘞窟。这些洞窟包括莫高窟第 465 号窟——唯一具有明确的密教图像的洞窟。我借助 Knut Martin Stünkel 建立的分析工具，即“超越—内在区分”（TID）的三个层次的模型来分析这些资料，以了解潜在的“超越过程”，其依据是“对象——语言层次”，而不是特定的超越概念。Stünkel 的分析是笔者所在的机构——波鸿鲁尔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CERES）的跨学科研究团体的成果；因此，本文试图探讨 TID 模型对中世纪中亚佛教背景的有效性。这个模型的应用使得人们可以分析空间的转变过程，包括仪轨洞窟的物理空间和身体空间，因为据说修行者对空间的感知可从“内在的”转变为“超越的”感知，这必然也会他们对时间的感知产生影响。

(11) Sinclair, Iain: 《西藏和西夏帝国的金洲所传不动明王研究》，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366–399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99/94/9994b57e-69af-4fe0-933f-68f916d251f3/9789004507937_17-sinclair.pdf

摘要：

在西藏和西夏帝国（约 1038–1227 年）的艺术中，直到 13 世纪末都可以看到不动明王的形象，它幻化出十个忿怒尊，践踏着犍尼萨（Ganapati）的象头。这种形式的不动明王尊据说是由东南亚的金洲大师（藏文：Bla ma gSer gling pa）所传。其修行方法由他著名的孟加拉学生觉沃杰（藏文：jo bo rje）阿底峡（Atiśa Dīpaṃkaraśrījñāna, 982–1054）传到西藏，他在西夏帝国被简单地称为 Dīpaṃkara。由于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修行传统在西藏文化圈外保存下来的痕迹太少，或可追问，这种独特的不动明王形象是否曾经由东南亚的老师所传授？对这一人物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陆上丝路北段和海上丝路之间的罕见交汇。本文结合许多相关的艺术作品，研究了金洲大师和阿底峡关于不动明王的著作，其中一些作品以前并没有被与金洲大师的传统联系起来过。

(12) 侯浩然：《黑水城出土的大黑天文献研究》，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400–429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15/3f/153ff203-2dae-4182-b440-e6474602d134/9789004507937_18-hou.pdf

摘要：

笔者在本文中介绍了黑水城出土的与大黑天（Mahākāla）有关的藏传佛教密宗手稿，这些手稿同时使用汉文和藏文，时间跨度为 12 世纪至 14 世纪。通过对这些双语材料的比较研究，笔者勘定了汉文本相应的藏文原件，并以此确定黑水城出土的大黑天文献的来源。由此，笔者认为藏族大师管译师·宣奴贝（1105/1110–1198/1202，藏文：rGwa lo tsā ba gZhon nu dpal）与黑水城的汉文和藏文大黑天文献都有联系。随后，通过对管译师传记的研究，笔者揭示了他是如何将大黑天教法从印度经西藏一路带到西夏（约 1038–1227）的。最后，笔者分析了黑水城出土的管译师所写关于大黑天的作品之一，并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大黑天早期文本的传播中的作用。

(13) Wilkens, Jens: 《初探回鹘佛教文本中的实修和仪轨》，载于 Kasai, Yukiyo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I：实修和仪轨，图像和物质转移》，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2 年，第 430–464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d8/fa/d8fada67-1661-47c6-a8af-41aa80fcd67f/9789004507937_19-wilkens.pdf

摘要：

不同于藏传、汉传或印度传佛教研究，回鹘佛教的仪轨和实修主题尚未被细致地研究过。相反，到目前为止，回鹘研究的重点在于整理各种版本和译本。虽然古回鹘语文献的某些类型——如忏悔文和密宗材料——显然必须在佛教仪轨的框架内被理解，但仪轨框架对其他类型的文本的适用性并不十分明显。有明确仪轨背景的回鹘佛教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汉传和藏传佛教的传统。本文探讨了可以建立回鹘文献仪轨框架的诸多背景（如节日, 观想, 陀罗尼, 辟邪物, 护身符等等）。